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薪火映黔山

抗战期间，贵州作为战略大后方、西南大枢纽，承担了援华物资转运任务，援华运输大动脉均需过此交通要津，可谓“抗战生命线”。旧州机场成为贵州境内对日作战的机场，美国飞虎队战机频频在该机场起降作战；国际援华医疗队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扎根贵阳图云关，来自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奔走在抗战后方与前线，国际卫生战士牺牲后长眠图云关，现存有贵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遗址等实物……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抗战岁月里，贵州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国际壮歌。

中印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该路在抗日战争中作用重大。
资料图片

中美联合抗战的历史地标

“这里就是见证美中合作友谊的活历史。”7月中旬，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一行来到贵州，沿着飞虎队当年的战斗足迹，探访晴隆二十四道拐、黄平旧州机场等地，在他看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抗战故事见证了中美联合反抗法西斯的光辉历史。

时间拉回到20世纪30年代，日军先后占领华东、华北、华南，北京、南京、武汉等地，沿海主要港口被封锁，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日本为了尽快占领中国，开始了更为疯狂的行动。日军封锁以香港为中心的航空运输华南线，截断以越南海防港为主干的西南线。同时，日军全面占领宜昌，封锁长江运输，陪都重庆成为孤城。作为支持全国的大后方，贵州地处连接川、滇、桂、湘的枢纽位置，国际援华战略物资要先通过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或中印公路运至云南昆明，再通过大卡车经过滇黔公路运往湘、桂等抗战前线以及抗战大后方重庆。

为保证物资运输，贵州全省各地修建了大批军用机场，如清镇机场、旧州机场、独山机场等。

这些机场的新建、扩建和启用，也让当地人口逐渐增多。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作为湖南芷江机场的后卫，旧州机场的作用凸显。常驻于此的美国飞虎队战机频频在该机场起降，参加了湘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从1943年秋起到1945年春末，其停驻的中美空军与日本空军作战数十次，先后出动各类战斗机、重型轰炸机百余架，击毁击伤日机120余架。

“站在这里，我更能体会到贵州人民用血肉筑起抗战通道的伟大。”杰夫·格林动情地说。

国际友谊长青

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晴隆二十四道拐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无数车队从这里翻越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将物资补给源源不断地运输至战斗前线，是一段镌刻着民族血性与国际友谊的史诗级公路。

日军曾多次派飞机对晴隆二十四道拐公路进行轰炸，欲截断黔滇咽喉。自1940年起，美国陆军战时生产服务部晴隆办事处迁入晴隆县城，负责整修包括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在内的部分路段。

为满足每月运输15万吨战略物资的运输需求，1943年，援华美军司令部特派美军公路工程部队第1880工兵营驻守晴隆沙子岭，并与当地百姓克服日军轰炸、物资匮乏等诸多困难，对晴隆二十四道拐路段实施改造和维修。

二战研究专家、晴隆二十四道拐的发现者云南专家戈叔亚曾说：“贵州的公路运输数量超过云南任何一条公路……甚至超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量的一倍。”

1945年，美国随军摄影师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二十四道拐照片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轰动世界，被世界各大媒体反复转载。

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长朱仁印看来，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堪称中国险峻公路建设史上的杰出典范，是中美两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历史的真实写照。

今年8月中旬，当年国际援华医疗队匈牙利籍医生乔治·沈恩的后代皮特通过微信联系图云关救护总队后人杨永植，表明要来贵州参加图云关相关纪念活动。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德国的红十字会派遣医生和专家4人，携带40卡车价值约50万元

的设备和用品来华；9月，印度派遣包括柯棣华大夫在内的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战地救护工作；10月，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国际医药援华会，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辗转多地迁至贵阳，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一批批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英国等国的志愿者，不远万里奔赴贵阳图云关，援助中国抗战救护。

今年8月26日，从保加利亚、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等地远道而来的20余位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后裔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后裔代表，怀着同一份思念，踏上先辈曾经战斗过的贵阳图云关，缅怀他们的抗战功绩。

“西班牙医生”援华

虽然并没有西班牙国籍的医生，但他们都来自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场，被称为“西班牙医生”。他们绕过半个地球，1939年分3批到达贵阳图云关，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到各战区的救护工作中。乔治·沈恩就是其中一员。

战时贵阳图云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极其简陋，习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外国医生，改吃大米饭和中国菜并不容易。最让他们为难的是拿筷子，学了许久手仍不听使唤。时日久了，他们由不习惯到喜欢中国菜。几十年后有记者采访保加利亚籍医生甘扬道，他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中国饺子如何好吃，特别提到贵阳的臭豆腐。

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至今仍有不少当时的医疗器械陈列在位于贵阳图云关的纪念馆内。

尽管如此，援华医生们努力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

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用石灰和硫磺调制经济涂剂，先后治愈了大量疥疮患者；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就地取材建立竹子医院，用竹子搭起简易手术室和手术台；德国化验员孟威廉在缺乏自来水 and 器皿的情况下，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等。

英国籍女医生高田宜于1941年随“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贵阳。1942年3月，救护总队将派一支队伍前往浙江，摸底当地鼠疫暴发的情况。高田宜不顾身体不适，在启程前冒险接种鼠疫疫苗，引起严重过敏反应，以身殉职，长眠图云关，时年31岁。

1939年冬，在红十字会中共特别支部的配合及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运输队协助运送。时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带队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送给八路军，并派车运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

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救护队员还在贵阳图云关收获了爱情。

乔治·沈恩与中国姑娘朱瑞玉结为伉俪，携手救治过众多中国伤病员。抗战胜利后，一些外国医生陆续回国，白乐夫、严斐德、柯让道等人则受聘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中国继续行医，乔治·沈恩则回国从事中匈友好工作。

为永远铭记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不朽贡献，贵阳市在图云关原救护总队旧址竖立了一座纪念碑，背面刻有48个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名字。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运营负责人商梦娇说，参加中国战场救护的外籍医生不止48人。

如今，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已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文化传播教育基地、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贵州省红十字历史文化陈列馆，每年都有不少居民、游客前去瞻仰。

专访

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裕声

贵州让同盟国看到了中国抗战的韧性与希望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为从更多维度探寻贵州在抗战期间的历史功绩，记者采访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裕声。

记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您认为贵州在战略地位上具有怎样的优势？

肖裕声：贵州凭借独特地理区位与战略价值，在抗战大后方格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发挥西南陆路枢纽作用。贵州地处滇、桂、湘、川四省交界，扼守重庆陪都南大门。为保障《租借法案》物资运输，美军联合当地民工加固公路，使车队昼夜通行，将物资直送重庆、桂林，成为支撑抗战物资运输的“陆上动脉”。

其二，成为盟军空中战略支点。贵州高原平坝地形被转化为空军基地，黄平旧州机场扩建为盟军西南最大空军基地之一。中美空军以此为据点，击落、炸毁日机120余架，并对日军实施遮断轰炸，挫败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

其三，构建陆空立体防御体系。贵州形成公路运输与空中作战双向互补机制，史迪威公路运抵的物资可在旧州机场装机空投，飞虎队情报引导车队规避伏击。1944年的黔南事变中，日军因贵州立体防御体系与黔南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最终止步于独山、荔波一线。

贵州以山地屏障、陆路枢纽与空中支点为核心，构建起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上罕见的立体战略体系，其战略价值不仅维系了国际通道，更通过军民协同与盟军配合，为中国抗战注入持久动力，让同盟国看到了中国抗战的韧性与希望。

记者：抗战期间，贵州在后勤保障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肖裕声：贵州作为战略大后方，在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案例

黔军家书见证打通国际通道的壮烈一战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第于去年7月由贵州遵义出发一直达云南的河口，驻防蒙自县芷村整训……不日要出发向阵地，达云南的保山……和鬼子拼命。”近日，贵阳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馆长龙兴旺向记者展示了一封81年前黔军战士、中国远征军103师308团一营二连副连长韦元森寄往独山的家书。

松山战役是抗战末期，中国远征军以牺牲7000人为代价，在滇西用最惨烈的方式消灭盘踞松山的日军、打通国际救援线滇缅通道、拉开对日战略反攻序幕的著名战役。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大垭口村，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松山盘踞43公里。作为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松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被誉为“东方直布罗陀”。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决定性战役松山战役、腾冲战役次第打响。

韦元森的家书写于1944年7月1日，当天，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下达命令：命第八军在3日内完成作战准备，5日向负隅顽抗的松山日军发起攻击。

7月2日，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八军接替71军作战，向松山侧背发起进攻，相继攻克腊勐、汪家寨等据点，完成对松山的包围。

第八军原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属的总预备队，下辖103师、82师等黔军部队，属于名副其实的“草鞋兵”队伍，贵州人何绍周任军长，韦元森就在这支黔军部队。

松山战役打响后，103师的主要任务是攻取滚龙坡、大垭口、长岭岗等日军阵地；82师在松山攻坚战中的主要任务是攻占松山顶峰主阵地。

医疗方面，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携国际援华医疗队迁驻贵阳图云关，这里成为全国战地救护指挥中心、军医培训基地及物资集散地，为抗战医疗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物资保障方面，贵州征粮总计稻谷1242万余石，平均每人负担12石，并发行公债578亿元，支撑了战时经济。在交通领域，贵州组织近1300万人次民工抢修公路2285公里，扩建、新建机场，保障了晴隆二十四道拐等运输线的畅通。此外，贵州还接纳了大量内迁机构、学校与难民等。

正如《贵州革命史话·黔西南卷》记载，北盘江两岸村民主动协助部队抬筑浮桥，保障运输线畅通，体现了军民协同的强大力量。贵州以“贫穷小省”之躯，在医疗、物资、交通等领域全面动员，为抗战胜利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后盾。

记者：松山战役是被写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案的经典战役，从这场战役来看，黔军在二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肖裕声：发生于云南省龙陵县的松山战役被西点军校列为“山地丛林攻坚典范”，关键在于它以战役级投入达成了战略级目标：拔除日军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打通中国抗战唯一陆路国际通道，使租借法案物资直输重庆，其意义远超29平方公里的山头。

战术层面，远征军首创“坑道爆破”，全歼日军第113联队，首次在亚洲战场迫使日军“全员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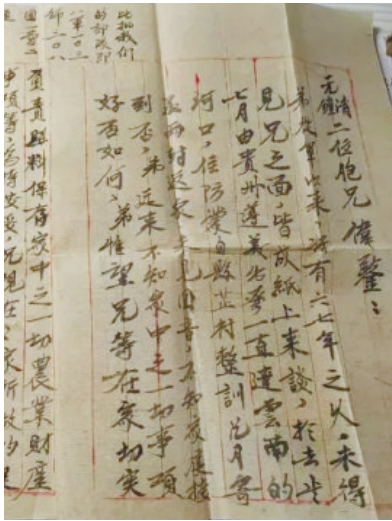
参战主体方面，主攻部队第八军及前期第28师都来自于黔军，军长何绍周、师长王伯勋、王景渊均为贵州籍。黔军凭高原地形练就耐力，以1:6.2战损比换取全胜。战后，《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被译成英文，列入美英陆军山地训练教材。因此，有学者把这场战役也称为：“日本九州兵与中国贵州兵的一场决战”。让世界看到了来自于贵州子弟兵的血性与担当。

修建黄平旧州机场的民工拉着10吨重的石碾来碾平跑道。

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修建黄平旧州机场的碾子上“打倒日本”几个大字清晰可见。

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龙兴旺 供图

县，居住在能望得见松山的竹箐村，每天早上推开门，他就向松山的方向敬一个军礼。

2023年，龙兴旺背上家乡的土和酒，沿着远征军的出野路线前往腾冲中国远征军黔籍抗日殉国将士纪念碑祭奠。回来时，他将殉国将士墓园内的土盛了满满一碗，撒在黔灵山上，嘴里说着“回家了！”